

1980年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述评

张天明

内容提要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属于历史认识问题,即日本人如何认识当年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所进行的侵略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严重动摇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交往的政治基础,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1980—1989年,我国学术界主要简单介绍和分析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1990—1999年,集中探讨“家永教科书诉讼案”;进入21世纪,则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表现、实质、原因、影响、对策等方面,更为关注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重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注重借鉴欧洲教科书问题解决的 经验。

关键词 日本 历史教科书问题 述评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极大地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严重动摇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交往的政治基础,成为威胁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因素之一。目前,中日关系虽处于较为良好的态势,但教科书问题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认真分析日本教科书问题,继续探寻有效的解决途径,依然是广大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不能忽视的研究主题。本文拟就我国大陆1980年以来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进行述评,以利于学界的进一步认识和研究,从而为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尽绵薄之力。

一 研究概述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与靖国神社问题、战争赔偿问题、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慰安妇问题同属于历史认识问题的范畴。日本人正确认识历史,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承担战争罪责,这是战争受害国与日本交往的底线。因为只有这样做,日本才能避免军国主义复辟,才能够得到战争受害国国民的理解,才能够接受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①遗憾的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历史教科书问题就是其典型表现。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改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冷战开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逆转,右翼势力在战后日本又重新滋长。1951年,日本文部省将《学习指导纲要》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了“进出”。1958年,日本的一些教科书中就已出现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端倪。20世纪60年代,歪曲历史史实的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进一步蔓延;70年代以后,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行更是愈演愈烈。

^① 步平:《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第202页。

随着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1982和1986年日本国内两次出现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逆流,国际性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此正式开始。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不仅出现了所谓反对“自虐”史观的“国民运动”,而且陆续组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简称“新编会”)等右翼历史教科书编撰团体。2001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新编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该书宣扬皇国史观,否认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美化日本殖民统治。200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对该书放行。2009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新一轮教科书审定中,仍然通过了沿袭《新历史教科书》80%内容的由“新编会”成员撰写、自由社发行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当然,具有良知的正义人士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如持续长达34年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就是其典型代表之一。美国学者康斯坦丁曾评价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永三郎个人努力的结果。^①又如日本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新历史教科书》普遍采取了批判和抵制的态度,因此,该教材2001年的采用率仅为0.039%,2005年也只有0.04%。可见,歪曲历史史实的这部教科书在日本国内并不受欢迎。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备受国人关注,但该问题真正引起学界普遍重视则是进入21世纪后。1980—1999年,虽然我国举办了许多有关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的学术会议,但这些会议较少论及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跨入21世纪后,我国相继举办了一系列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直接相关的研讨会。200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戴逸、刘述礼、赵阶琦等30多位专家学者,就日本教科书事件召开了座谈会。9月,中日教育工作者在北京召开了关于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座谈会,同年还召开了“第10次国际历史教科书学术会议”。2002年3月,中日韩三国学者为商讨共编东亚三国近代史的计划,在南京召开了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2003年,我国学者相继组织召开“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抗日战争史实调查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2005年,召开的相关会议主要有“纪念亚洲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国际学术座谈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中日历史观座谈会”。2006年召开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08召开了“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批判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这些会议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学术界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研究。

从1980到1999年,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者屈指可数,且基本上来自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史学或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而进入新世纪后,相关研究者的队伍日益庞大,专业范围更加广泛,而且既有知名学者也有学界新秀。《抗日战争研究》《日本学刊》《当代韩国》《全球教育展望》《历史教学》等期刊杂志,积极引导和支持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网、八一八爱国网、新浪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亦广泛宣传 and 大量报道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进展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等学者,多次做客人民网、新浪网、中国网等,就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网民朋友进行交流。^②

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学界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据笔者检索,

① [美]康斯坦丁·N·威普瑞斯著,朱晓凯译:《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5期,第169—177页。

② 荣维木:《历史教育与东亚和平》,neverforget.sina.com.cn/pe/2004-03-25/1947131.html《〈新历史教科书〉的恶意篡改》<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820171856.asp> 步平、荣维木:《在中日论坛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http://japan.people.com.cn/GB/35467/35498/3456213.html> 2005年6月9日;步平:《共同研究历史 中日需要冷静环境》http://webcast.china.com.cn/webcast/created/1180/91_1_0101_desc.htm;《站在东亚角度写历史》,<http://news.sina.com.cn/w/2005-05-20/05365936604s.shtml>

1980—2009年中国大陆共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58篇,其中 1980—1999年仅有 17篇,而 2000—2009年多达 141篇;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较为突出的 2001年和 2005年,分别发表 39篇和 41篇;相关硕士学位论文 4篇。^①

截止目前,我国学界还出版了 3本在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方面颇有影响的著作。即,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该书系统地梳理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如日本战前与战时教科书如何为军国主义服务,战后日本教科书“改善”与“改恶”的斗争;深入地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内与国际政治背景及其对日本社会和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全面剖析了日本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史观和被歪曲的历史事实;“附录”部分还详列了日本教科书问题大事年表。故而,该书被学界誉为“研究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开创性力作”。^②苏智良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细致分析了日本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过程、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斗争历程、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右翼的历史研究组织、教科书问题实质、世界各地对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教科书的反应等方面的问题。王智新、刘琪的《揭开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黑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版),共分教科书问题的缘起、从“侵略”到“进出”、《新编日本史》教科书事件、《新日本史》的出笼、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结症、反对新日本史的呼声等 6章,全面阐述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发展演变历程和现状。

总体上说,学界从 1980至 1989年仅限于简单介绍和分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而从 1990至 1999年则集中探讨“家永教科书诉讼案”,如步平的《家永三郎和日本教科书诉讼案》(《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 5期)和《教科书诉讼案和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黑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 1期)、宋进的《“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扫描》(《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 3期)、高兴祖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来龙去脉》(《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 6期)等,都是其代表性的学术论文。

进入 21世纪,学界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表现、实质、原因、影响及其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如李秀石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1947—2002)》(《历史研究》2002年第 5期)和苏智良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由来与现状》(《全球教育展望》2005年第 10期),分别从纵向角度详细梳理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荣维木的《谁在制造谎言——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求是》2000年第 6期),更为关注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问题。吴科达的《中日教科书问题的最早纷争》(《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 2期)和王志的《从战前小学历史教科书看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历史教学》2008年第 10期),从战前日本的教科书探寻现今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源头。步平的《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 1期),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提出解决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相应对策。徐秀丽的《欧洲经验对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启示及其局限》(《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 2期),已突破从东亚的视角思考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局限,开始关注欧洲教科书问题解决的经验。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研究

不少学者通过纵向梳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大都认为该问题经历了三次斗争浪

① 朱敏:《日本教科书问题透析》东北师范大学 2002年;荆卓:《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评析》南开大学 2005年;金美星:《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根源与实质》延边大学 2006年;杨普安:《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根源探析》贵州师范大学 2008年。

② 于武:《研究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开创性力作》,《光明日报》2002年 9月 28日。

潮。步平的“三次攻击”说^①、苏智良的“三次斗争浪潮”说^②、李秀石的“三次篡改攻势”说^③、刘丹忱的“三次逆流”说^④、藏佩红的“三次事件”说^⑤、苏明飞“三次教科书风波”说^⑥等,虽名称不同,但分期基本一致。即,1. 20世纪5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发动了第一次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攻势;2. 20世纪80年代,日本文部科学省先后两次审定通过右翼团体组织编写的歪曲历史史实的教科书;3. 从1996至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相继两次审定通过了“新编会”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再次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经历了四次斗争浪潮。如,李鹏军认为该问题至今先后发生四次,即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1982—1983年的第二次、1986年的第三次以及1997至今的第四次。^⑦韩国学者许东贤亦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先后发动了四次教科书攻击,第一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第二次从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第三次发生于2000和2001年,第四次发生于2005年。^⑧另外,杨升祥等人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四次篡改”说,即二战前后的“修改”,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修订”;80至90年代的篡改;21世纪初期的再度篡改。^⑨

(二)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表现研究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主要表现在宣扬错误的历史观和隐瞒、淡化、歪曲具体史实两个方面。不少学者针对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反映的皇国史观、军国主义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自由主义史观、本国中心史观等错误史观,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判。荣维木、金熙德等人批判“新编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战争性质上颠倒黑白,指责其所谓战争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和侵略“有理”论是一派胡言。^⑩许斌指责《新历史教科书》充满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统治亚洲观和本国中心史观。^⑪郭素美、王希亮、王智新等人认为,《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如出一辙,是一部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教科书。^⑫

步平、荣维木、苏智良、刘丹忱、吴广义等学者以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编辑部^⑬,都分别揭批了

① 步平:《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历史考察》,《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8期,第56—59页。

② 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由来与现状》,《全球教育展望》2005年第10期,第7—13页。

③ 李秀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1947—2002)》,《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26—141页。

④ 刘丹忱:《历史岂容肆意颠倒——日本2002年“新历史教科书”评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1期,第107页。

⑤ 藏佩红:《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学刊》2005年第5期,第149页。

⑥ 苏明飞、张晓菲:《对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考察》,《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第41页。

⑦ 李鹏军:《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及缘由》,《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第99—100页。

⑧ [韩]许东贤:《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背景及特点:历史记忆的歪曲与反省》,《当代韩国》2005年第2期,第1—6页。

⑨ 杨升祥、杜鸿林、李志:《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过程、根源与实质》,《理论界》2005年第10期,第181页。

⑩ 荣维木:《谁在制造谎言——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求是》2000年第6期,第26页;《历史教育与东亚和平》, neverforget.sina.com.cn/pe/2004-03-25/1947131.html 金熙德:《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当代亚太》2001年第5期,第27—31页。

⑪ 许斌:《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的警示》,《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第111—113页。

⑫ 郭素美、王希亮:《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第171—186页;王智新:《“日本会议”与〈最新日本史〉》,《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第187—206页。

⑬ 步平:《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第154—179页;荣维木:《谁是战争的祸首——评日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对中日战争的描述》,《民国档案》2002年第3期,第61—65页;《〈新历史教科书〉的恶意篡改》, <http://jls.cass.cn/Article/20050820171856.asp> 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38页;刘丹忱:《历史岂容肆意颠倒——日本2002年“新历史教科书”评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1期,第107页;吴广义:《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侵华战争记述评析》,《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第47页;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编辑部:《日本〈新历史教科书〉是怎样篡改侵华历史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年第7期,第12—14页。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具体史实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有:把“满洲人”排除在“中国人”以外;甲午战争起因含糊;“二十一条”为中国造;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均“责在中国”;否认南京大屠杀;回避“慰安妇”和万人坑及七三一部队等问题;中日战争是共产党挑唆;对外“侵略”改为“进入”;轻描淡写“三光作战”;否认屠杀海外华人华侨;只字未提活体解剖、制造贩卖毒品等暴行;将侵略战争描绘成“民族解放战争”,把侵略后建立的“伪满洲国”,说成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家”;美化日本在占领区的政策;夸大日本的战争损失;鼓吹“东京审判”合法性待定论等。

日本右翼分子企图通过隐瞒、淡化、歪曲历史事实等手段,宣扬侵略有功,推卸战争罪责。但是,诚如日本进步学者指出:“任何学科的教科书,应该有必须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至少是在教科书中不能有虚假和虚构。”^①显然,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编写的一些历史教科书根本不符合这个最低标准。

(三)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研究

朱实早在1982年就指出,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实质是企图恢复二战前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复活军国主义。^②21世纪以来,学界在该方面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张海鹏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就是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一再对进步力量扭转历史教科书保守倾向努力的反抗,其核心是如何对待侵略战争责任和战后宪法,其实质在于是否倒退到战前宣扬“皇国史观”和鼓吹军国主义的问题。^③赵阶琦、孙智昌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多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实质就是企图通过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及战争罪行,为日本民众树立“新的精神支柱”,为日本扩充军备、谋求大国地位的政治目的服务。^④杨升祥等人认为,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实质是宣扬新国家主义,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向国民灌输皇国史观等。^⑤韩立萍比较了当今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与伪满历史教科书,认为两者的实质都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歌功颂德。^⑥

汤重南、苏智良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是历史认识问题,即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侵略历史的问题。^⑦步平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建立起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肯定战前日本的“国体论”,从根本上转移或淡化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⑧李秀石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篡改问题不仅仅是日本的内政,也是日本与中、韩、朝等亚洲国家的外交问题。^⑨金美星认为,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它反映出日本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需要,决定日本国选择深刻反省历史罪行,还是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下一代各国国民之间的交往。^⑩

(四)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影响研究

刘江永、吴广义指出,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将导致许多日本学生和民众不了解乃至不

① 杨宁一译:《日本学者声明——不能把历史教育委于歪曲史实的教科书》,《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第169—172页。

② 朱实:《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背景》,《国际展望》1982年第41期,第2—8页。

③ 张海鹏、步平主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3—4页。

④ 赵阶琦:《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和平与发展》2001年第1期,第16页;孙智昌:《日本右翼势力与历史教科书问题》,《历史教学》2003年第1期,第55页。

⑤ 杨升祥、杜鸿林、李志:《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过程、根源与实质》,《理论界》2005年第10期,第181页。

⑥ 韩立萍:《伪满洲国历史教科书与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比较》,《财经界》2006年第4期(下),第203页。

⑦ 汤重南:《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当代韩国》2001年第3期,第48页;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由来与现状》,《全球教育展望》2005年第10期,第7—13页。

⑧ 步平:《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第230页;《关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0期,第25页。

⑨ 李秀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1947—2002)》,《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26—141页。

⑩ 金美星:《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之分析》,《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第35页。

承认对华战争的基本史实和侵略性质,拒绝反省侵华战争历史并承担战争责任。^①金熙德认为,“历史问题”始终是损害日本国际形象的致命弱点,使日本难以“入亚”而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半永久地依赖美国,给日本迈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拖后腿,从长远看,右翼教科书将再生出军国主义思想的后代,最终受害最甚者莫过于日本自身。^②步平强调,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具有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的危险性。^③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与国际政治体系息息相关,因此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一定影响。陈景彦指出,《新历史教科书》公然歪曲历史,否定和美化侵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必将增大中国人民对整个日本民族的不信任感,拉大两国间的历史认识距离,加深感情上的鸿沟,增加相互理解的障碍,使已经出现了问题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④唐安杰认为,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势必激起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也必然引发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逆流的再认识。^⑤杨彪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史进程。^⑥

(五)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学界颇为关注导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原因。不少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心理、教科书制度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积极探讨。

1. 政治原因

政治原因有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大原因。目前,学者们主要从日本国内政治方面分析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发生的原因。张海鹏、刘江永、卞修跃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及其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不彻底性。如,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追究日本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责任等,长期未能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张海鹏还认为该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日本政府总希望把国民意志转移到新国家主义之上,欲重塑国家形象。^⑦李秀石等人认为,篡改历史是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需要,日本想以此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窘境。^⑧步平指出,该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日本右倾和保守势力的活动猖獗,他们不仅直接参与篡改教科书,同时还对多家出版社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⑨陈景彦认为,《新历史教科书》事件的发生还有其“群众基础”和官方的默许,同时还有许多日本大企业、大财团的财力支持。日本知名学者笠原十九司披露,日本教科书问题的产生确实得到了右翼国会议员们的支持

① 刘江永:《歪曲历史将误导未来》,《日本学刊》1996年第4期,第1—17页;吴广义:《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侵华战争记述评析》,《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第47页。

② 金熙德:《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当代亚太》2001年第5期,第27—31页。

③ 步平:《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第230页。

④ 陈景彦:《也谈日本〈新历史教科书〉问题》,《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2期,第52页。

⑤ 唐安杰:《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之史观》,《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第22页。

⑥ 杨彪:《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战争记述问题及背景分析》,《全球教育展望》2005年第10期,第24—30页。

⑦ 张海鹏、步平主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4—5页;刘江永:《歪曲历史将误导未来》,《日本学刊》1996年第4期,第16页;卞修跃:《〈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第184页。

⑧ 李秀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1947—2002)》,《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26—141页。

⑨ 步平:《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第154—179页。

和各种媒体的帮助。^①李鹏军、苏明飞指出,日本的遗族会亦是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②

部分学者还探讨了日本历史教科书发生的国际政治原因。钟严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也面临新的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政治腐败导致政局动荡;外国劳工大量涌入,社会矛盾复杂化。于是,右翼势力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日本等国有所抬头;苏联解体后日本视中国为“潜在威胁”;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支持等,所有这些正是2001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发生的国际大背景。^③卞修跃指出,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不足、亚洲邻国经济力量不足与日本相抗衡、各国对日外交方针因利益不同而无法在对待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上协调一致等因素,也是造成日本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顽固坚持错误立场的重要原因。^④

2 经济原因

卞修跃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及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从物质的层面上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打足了底气。^⑤姜良芹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首先,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刺激了政治欲望的膨胀,日本的大国意识再次萌发,要求“重新认识”历史;进而,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日本政府试图借该事件来转移国民视线;而日益增多的民间索赔案,又成为教科书修订的直接经济动因。^⑥龚常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越改越黑”是由于危机感很强的日本人欲通过提高国际影响力来争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资源。^⑦

3 思想原因

荣维木指出,日本右翼对历史的歪曲,从根本上说是受到军国主义史观和皇国史观的支配。^⑧王卫星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日本社会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而这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的思想基础,就是“自由主义史观”。^⑨吴广义、王希亮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民意识的日趋保守化和新民族主义的滋生,导致蔑视亚洲国家的“脱亚入欧”观念和“民族净化史观”的蔓延,从而为该问题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⑩张海鹏、步平认为,日本社会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渐强化对亚洲民族的歧视没有消除,鼓吹自我国体优越、大和民族优秀,也是其篡改历史的一个根源;而战时日本教科书中鼓吹“大东亚战争史观”的现实影响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的又一个原因。^⑪

步平特别强调,日本学术界一直流行的所谓“无构造”历史观是日本人对近代侵略战争不能作

① 陈景彦:《也谈日本〈新历史教科书〉问题》,《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2期,第52页;[日]笠原十九司:《南京大屠杀与教科书问题》,《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第153页。

② 李鹏军:《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及缘由》,《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第99页;苏明飞、张晓菲:《对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考察》,《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第41页。

③ 钟严:《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由来与实质》,《日本学刊》2001年第4期,第48页。

④ 卞修跃:《〈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第184页。

⑤ 卞修跃:《〈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第184页。

⑥ 姜良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经济背景》,《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3期,第90—94页。

⑦ 龚常、沈林:《越改越黑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环球时报》2005年3月28日。

⑧ 荣维木:《谁在制造谎言——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求是》2000年第6期,第26页;《关于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思考》,《北京观察》2005年第8期,第28页。

⑨ 王卫星:《自由主义史观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第53页。

⑩ 吴广义:《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侵华战争记述评析》,《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第47页;王希亮:《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说明了什么?》,《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第7页。

⑪ 步平:《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红旗文稿》2005年第15期,第2—5页;张海鹏、步平主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6页;步平:《历史问题:中日关系中的不安因素》,《同舟共进》2007年第4期,第8页。

彻底反省,从而在教科书问题上一错再错的一个思想远景。这种“无构造”的历史观不关心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考虑历史环境与背景,单纯地强调微观的实证研究。^①

4 社会心理原因

李守福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社会心理原因有三:第一,在封闭的岛国环境中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自尊与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和开放与守旧对立的双重性格;第二,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农村共同体和武士家臣团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意识,同时也缺失了自我定位意识;第三,日本封建社会还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纵向主导型的非亲族协力关系支撑这种关系的社会伦理,同“孝”相比更强调“忠”。^② 杨彪、金美星指出,“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一直存在着的‘脱亚论’的潜意识”^③、“畸变的武士道和日本民族独有的耻感文化”^④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文化心理基础。

5 教科书制度原因

王智新、藏佩红指出,日本教科书的发行由特定的出版公司垄断,文部科学省通过审定与学习指导要领介入教育内容,教科书的选用权又集中在文部科学省授意的教育委员会手中,这便为保守势力重新利用教科书向青少年学生灌输错误的历史观提供了方便。^⑤

(六)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对策探讨

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屡次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严重阻碍着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人们极为关注。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本质上是历史认识问题。因此,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必须消除两国历史认识上的差异。步平认为,中日之间产生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同时,“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法是加强相互交流与理解,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共同历史研究、编写教科书来促进不同国家间历史事实的共有。通过共同历史研究促使两国人民适当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这是历史共同研究的主要目的。^⑥

2002年初,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教师开始共同编写历史读本,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于2005年5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三国同时出版。中方编者之一荣维木指出,通过这种对历史的共同描述,不仅可以纠正被右翼歪曲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描述已成为三国人民进一步沟通的一个渠道。^⑦该书出版后,受到了三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日、韩两国一版再版,订数与日俱增。特别是在日本,发行量取得了令人吃惊的结果。而在中国,发行后不久便跃升为图书发行的第一位。^⑧这证明通过共同研究历史来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策略是可行性的。

虽然,民间学者的努力有利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解决,但政府领导人的作用在该问题解决过程

① 步平:《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第207页。

② 李守福:《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社会心理探源》,《比较教育研究》2001年第7期,第45—49页。

③ 杨彪:《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战争记述问题及背景分析》,《全球教育展望》2005年第10期,第24—30页。

④ 金美星:《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根源与实质》(硕士论文),延边大学2006年,第2页。

⑤ 王智新、刘琪:《揭开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黑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藏佩红:《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学刊》2005年第5期,第149页。

⑥ 步平:《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第197—210页;《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第154—179页。

⑦ 荣维木:《关于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思考》,《北京观察》2005年第8期,第28页。

⑧ 步平:《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红旗文稿》2005年第15期,第5页。

中更为关键。张海鹏就曾指出,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題,如历史教科书问題、参拜靖国神社问題,都是日方引起的,不是中方引起的,为了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推进亚洲和平,首先要解决的是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问題。^①2006年底,“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全体委员会会议”召开,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启动了共同历史研究工作,标志着中日双方为促进历史事实的共有已经从民间合作走向了政府合作。

但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时间很短,难免在经验上有所缺乏,因此,积极汲取欧洲等其他地区相关经验,至关重要。李秀石指出,借鉴德国与波兰通过教科书交流事业实现和解的经验,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几乎是实现教科书问題解决的惟一途径。^②徐秀丽指出,德法自从开始共同研究历史以来,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教科书争议,这主要归因于两国现实利益和未来目标的一致。她认为,德法、德波共同研究历史的策略尤其值得仿效。如,政府采取相对超然的立场;历史共识从直接参与的学者弥散到学术界,进而影响公众;列出最有争议的论点展开讨论,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呈现作为多面体的双方关系。同时,她指出,中日历史问題与欧洲历史问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中日战争结束时及随后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导致与战争相关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处理;日本方面对战争责任的认知不够彻底;从历史上看,“欧洲认同”强于“东亚认同”;开始从事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作的时机和环境不同。因此,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需要参与各方进行创造性的努力。^③

三 研究的不足

1980年以来,学界虽在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題。就研究方法来说,我国学者以往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題主要采取文献法、历史研究法,而较少运用其他方法。但是,今后还应运用调查法、比较法、归纳法、统计法、分析法等其他方法。这些方法各具独特作用,如运用调查法,大力调查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被歪曲的史实,抢救活史料,也可以通过访问专业人士获取更多的解决教科书问題的建议;运用比较法可以比较分析日本的各种历史教科书,可以对比研究中日教科书问題与德法、德波教科书问題。

就研究视角而言,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基本上把教科书问題单纯地视作历史问題或历史教育问題,主要从历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其实,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題涉及日本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因此,我们今后还应该从法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等多角度进行全面研究。

就研究内容来看,至少还有如下几个方面尚须努力:

第一,加强分析相关书籍。

我国学界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扶桑社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而对于第二次教科书事件的主角《新编日本史》第三次教科书事件中的重要角色《新公民教科书》高中《最新日本史》以及一些相关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很少研究。“新编会”的系列产品——渡部升一主编的《国民的教育》中西辉政主编的《国民的文明史》田中英道主编的《国民的艺术》等著作,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因此,我们今后不仅要继续研究扶桑社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而且要加强对其他相关历

① 张海鹏:《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題》,《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第3—26页。

② 李秀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題剖析(1947—2002)》,《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41页。

③ 徐秀丽:《欧洲经验对解决中日历史问題的启示及其局限》,《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第145—150页。

史教科书和著作的深入分析。

第二, 加强探讨反篡改斗争。

截止目前, 学界重点研究了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活动, 较少探讨除家永教科书诉讼案之外的日本反篡改斗争和亚洲其他国家反对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斗争, 从而错失了不少与各国进步势力共同斗争的有利机会。因此, 今后我们应详细研究高岛教科书诉讼案、“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网络”、“支持高岛教科书诉讼会”、“日本教职员工会”等进步团体及其活动, 以及韩国、朝鲜、印尼等国的反篡改斗争。

第三, 加强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歪曲史实。

日本右翼分子多次强调, 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修改”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 而日本法庭也声称“教科书诉讼判决是以当时历史研究成果为根据”的。^① 因此, 我国史学界有必要加强日本侵华史研究, 尤其是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被歪曲的具体史实的历史研究。荣维木、孙宅巍、步平、苏智良、张连红、陈丽菲、王希亮、朱成山等学者, 虽然分别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细菌战、甲午中日战争原因等问题, 但仍有大量被歪曲的史实尚需纠正。今后, 我们还应深入细致地研究日本在占领区的政策、海外华人华侨遭受的屠杀等相关问题, 以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批驳歪曲史实的谬论。

第四, 加强国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研究。

加强国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相关研究, 可以为我国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但是, 目前仅见刘洪丰简要梳理了国外学界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修订问题的总体状况。^② 其实, 韩国、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学者, 以及美国、英国、荷兰等欧美国家的学者, 在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中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 我国学者虽对韩国、美国、英国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研究有所探讨, 却很少涉及朝鲜、荷兰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相关研究。因此, 我们需要大力加强国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相关研究。

中日两国乃至东亚各国关系要开拓创新, 走向新时代, 必须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为此, 一方面, 我们要利用当前中日友好的大好时机, 在维护历史真实的前提下, 与日本政府和学者就该问题展开真诚地对话与交流, 进一步共同研究历史。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对日本右翼势力保持高度警惕。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几度沉浮和日本右翼势力的依旧活跃,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解决该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 我国学术界同仁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更加深入地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从学术的角度促成该问题的最终解决。

(作者张天明, 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徐志民)

① 宋进:《“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扫描》,《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第207—218页。

② 刘洪丰:《日本历史教科书修订与国家主义思潮研究新进展》,《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89—193页。